

情怀黄河上游 致力西部发展

阎海旺 张吾乐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同志不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位领导人，而且还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今年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第 60 个年头。值此，我们谨代表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向费老表示衷心祝贺，祝贺费老在我国社会学等学术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巨大成就，也感谢费老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贯关心和支持。

六十年来，费老的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费老治学的宗旨为“志在富民”以通过深入基层、走村串户、调查研究为其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而后再出主意、提对策。由于长期的深入实践，费老获取了大量的基础素材，提出了许多对党和国家研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

费老不仅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对民族学、教育学、生态学等学科有深刻研究的学者。六十年来，费老几乎将他的一大半时间放在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上，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这就是边走边看，走一路、看一路、分析一路、探讨一路，特别是深入中国的边远贫困地区

阎海旺：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张吾乐：甘肃省省长

和少数民族地区 正如他的专著《行行重行行》书名一样,他治学严谨,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为己任的崇高思想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从 1984 年至 1995 年 费老曾先后八次来过甘肃 每次都是轻车简从 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地县和乡村活动。每次来都带着“富民”的重大问题 通过走访、调查 然后与省里的同志交换意见和看法,再提出对策和建议。1984 年 他首次来到甘肃 将甘肃作为西北地区的典型开始了这方面的分析研究。这不仅因为甘肃兼有西部几省区经济的和地理的共同特点,更主要的是由于甘肃是整个西部地区的区位中心,在东西部地区联合协调发展和改革开放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经过几次调查研究 费老形成了一个振兴西北经济的大构想。这就是以开发建设黄河上游地区为“突破口”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1988 年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期间 他和甘肃、青海、宁夏几省区领导交换看法之后,即组织了一批专家到甘肃考察。7 月 费老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一起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倡议。在费老和钱老的关怀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黄河上游两省两区 甘肃省、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经过充分酝酿、协商 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研究相关问题。随后 费老、钱老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向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上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黄河上游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性以及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必要性之后,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总体构想、开发思路和方针。

作为我国第二大河的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历经九曲十八弯 从西向东 横跨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 全长 5500 公里 流域面积约

75 万平方公里。一般认为，黄河上游指从源头至内蒙古托克托 2000 公里的狭长地带。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就是指包括青海省东部，甘肃省中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中部的约 21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通过调查，费老认为这一地区资源丰富，开发条件较好，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加快这一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对带动、辐射祖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解和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增进民族团结和巩固边疆、维护社会安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黄河上游地区是一个“金腰带”水力资源、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形成了发展工业的潜在优势。开发黄河水能不仅可以形成我国重要的梯级水电基地，为经济建设提供充足的能源，与开发矿产等工业联动；同时还为发展西部地区的农牧业和自然生态条件的改善以及防沙、治河，改变整个西部地区贫困面貌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建立和发展黄河上游经济开发区，对于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和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费老曾经有一个大思路即“区域中心说”。他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个经济中心，由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如同波浪式地一层层外延。而联系我国东西部经济的纽带黄河流域则缺少这么一个中心。因此，黄河上游开发区的建设将会成为东西部经济协调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建设好这个中心，可以实现东西部的双环联动，即东部加工业的发展带动西部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而西部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将支持东部外向型经济的扩展。这样不仅实现了东西部地区产业的合理分工，而且缓解了总供需的矛盾，同时通过东西部地区的内循环适应沿海地区的外循环，促进我国经济整体向更高层次迈进。

加快黄河上游地区的开发，对于整个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

有重要意义。这一地区位于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地带，通过建立和开发黄河上游地区，凭借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可以实施重开现代“丝绸之路”，推动西部诸省区联合走西口的宏大战略。对扩大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加强同周边独联体、中东等国家的经贸往来，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逐步步入外向型轨道，实施西部地区东西双向开放，经济、社会稳步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建立黄河上游经济开发区对于深化企业改革，挖掘现有企业潜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有重要作用。从这一地区现在的产业结构来看，重工业尤其是原材料、能源工业占据了很大比重，相反加工业则所占份额很低，这是造成这一地区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关联度低，资源潜力不能完全发挥，综合效益低下，生产力要素闲置和浪费等问题的因素之一。通过建立开发区，给予开发区一些政策，促进这些大企业和地方协作，培植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仅对搞活国有大企业有好处，而且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也是有益的。

费老通过长期的深入调查和研究，不仅实事求是、高瞻远瞩地阐述了开发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重要意义，而且同钱伟长同志一起，经过多次考察论证，提出了开发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具体设想和途径。

1. 发挥能源、原材料优势，建立产业聚集区。黄河上游有着丰富的水电、火电和多种矿产资源，还有一大批在原材料工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发展原材料工业及其深度加工工业的巨大的潜在优势。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要依托这个优势和基础，尽快把这个地区建成我国原材料工业生产综合开发的重要基地。以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重视这一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逐步建立起一个产业联动度大，后劲足的产业聚集区，避免前苏联“巴库”现象在我国西部的重现。

2. 在大力发展原材料工业的同时，把发展农牧业放在首位。充分利用黄河各级水库和充裕的电力，逐步建造各层次的高地水库，用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强化农牧业基础，改造西部地区自然生态失调的面貌。不断扩大和建造新的粮食、畜产品、油、糖和蔬菜及其它副食品基地。在广大农村，要按照农村改革的过程和中国农村勤俭节约的传统，鼓励和发动农民，以家庭为主，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把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充分地转变成生产力，走多种经营和发展乡镇工业的路子，这是一条使广大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可行途径，也是中国农村迈向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以此为基础和动力，进一步建立和发展科技、流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为农民服务的体系，由小到大，逐步引导农村经济走向专业化和规模经营的道路。

3. 利用原材料优势，发展深加工、短平快的中小企业。加强东部和沿海地区的横向协作与联合，发展与民生有关的轻工业，使千家万户都富起来。这样做不仅可以使本地区人民得到直接好处，而且还可以在矿藏及石油耗尽后，这些提供原材料的地区不致衰败而能保持长期繁荣。

4. 坚持走西口，扩大对外开放。以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为起步，瞄准已开通的亚欧大陆桥，重开现代“丝绸之路”，发展西部的外向型经济，加快这一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

5. 搞好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全局。以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区的开发为契机，加强大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协作，以改革为动力，探索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途径和办法，促进国有经济焕发新活力，保持和发挥这一区域内原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骨干和基础作用。

6. 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中

资金‘第一次’推动 政策支持和倾斜为辅的总方针。开发和建设要围绕依靠现有基础，通过深化改革和发挥现有各种优势，走由小到大，滚动开发的路子，逐步实现这一区域内经济走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西移奠定基础。

费老的亲切关怀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有力地促进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从甘肃省几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来看，甘肃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特别是在带动地方工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发挥能源、原材料资源优势 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提高区域经济整体实力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目前我省已建立的 8 个经济开发小区的情况来看，各自逐步形成了当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开始发挥它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小区试验推动了大区开发。我省于 1988 年率先建立了甘肃段黄河上游 5 个经济开发试验小区，后陆续增加到 8 个。这些小区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带动了我省黄河上游地区的能源、资源开发建设，而且还策应了四省区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起步。

小区开发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我省已建立的 8 个开发试验小区都是围绕甘肃黄河上游‘一岸两翼’（‘一岸’指黄河沿岸；‘两翼’指‘金昌’和‘西成铅锌矿带’）的能源、资源开发并由此延伸的。分属不同经济类型 即金昌东区、白银西区、连海、西成开发区属于资源开发型和资源主导型；临夏开发区属于民族商贸型；敦煌和天水北道开发区则属商贸、旅游型；兰州宁卧庄开发区（现为国家级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为高科技型。这 8 个开发试验小区作为我省黄河上游经济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几年的开发试验中 坚持自力更生 依托现有基础 从当地实际出发，在国家、省上没有直接单独投入的情况下，依靠优

惠的政策和灵活的机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还探索出了一些在落后地区搞经济开发的路子。金昌、白银、连海、西成等资源主导型试验小区，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和大中型企业携手合作的优势，走“地企结合”、“一厂两制”发展城乡集体经济的路子。依托试验小区的相对优势，凭借丰富的资源，兴办了一批以资源为主和相关的新型企业。连海小区的年产 3 万吨铝锭的宝川铝业有限公司和连海铝业有限公司，都是走股份制的道路，在不到一年内相继建成投产。金昌小区的镍都实业公司、金川铜管厂、电焊条厂、钢窗厂都在小区内生根开花并结果，已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甘肃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试验小区的建设走出了一条发展民族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新路子。我们建立了临夏民族经济开发试验小区，作为黄河上游甘肃段“一岸”的一个小区，以探索繁荣、振兴民族地区经济的途径。从实践来看，这几年临夏回族自治区紧紧抓住建立试验小区的机遇，以改革为动力，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商贸流通日趋发达，集贸市场交易额大幅度增加。他们将地方的畜产品运往国内外不同地区，也将海内外的商品运到了这个旱码头。这不仅拓宽了贸易渠道，增加了人民群众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而且给少数民族地区带进了新的思想和信息，推动了民族地区乃至全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我省的开发试验小区不仅是我省开发黄河上游地区能源、资源的探索者和先行者，而且已成为全省对外开放，深化改革的排头兵。在建区之初，省上对试验小区给过一些优惠政策，但其发展主要还是靠各试验小区依托现有基础，由小到大，走出了各具特色的路子。如白银、金昌小区，通过密切地方和企业的关系，积极为邻近的大企业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提供配套设施，依靠开发小区的“温室”效应，发挥区内国有大型企业资金、技术、人才的综合优势，地企结合、互惠互利、共同发展。金昌

小区 1994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4.8 亿元 其中地企结合这一块就占到 80%。这种地企合作在白银小区的地企领导中形成共识后 总结为“三不三互”。即地企之间“不分大小 互相尊重 不搞分割 互相协作 不分彼此 互相支持”。费老对我省试验小区的这一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不仅仅是改善地区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振兴甘肃经济的试验性工作,更重要的是,通过开发小区发展一厂两制、兴办集体企业,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母体”上“嫁接”出新生的集体企业 他们相互促进、共同繁荣,这就为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发展和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走出一条新路子。费老的这一高度概括和总结不仅对我们试验小区的发展和探索给予了肯定和支持,而且对当前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总结回顾过去,是为了把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将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针对当前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明确开发思路,调整和补充开发规划,为加快这一区域的规模开发和适应国家经济战略逐渐西移奠定基础。我们总的想法是:

1. 适时调整开发建设的思路,继续把眼光放在依靠挖掘内部潜力和依靠联合开发,走区域经济联合发展,推动黄河上游经济开发的路子。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统揽整个工作的大局,把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各项工作,纳入到西部地区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格局中去统盘考虑,以改革促开发,以开发推动开放,最终实现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健康运行。

2. 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以水电开发为先导和原材料工业为主的滚动开发的路子。逐步探索更有效、更符合实际的开发途径,把依靠新技术、高科技作为推动经济开发的主要动力,来安排项目和规划布局生产力。

3. 把开发区继续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一方面，在开发区内率先进行企业改革和体制改革的试验，积累经验，探索路子；另一方面，充分依靠区内的软硬投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优势，积极吸引国内外资金以入股、参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区域经济的开发。

4. 按照费老区域中心说的大思路，积极、主动地加强省区之间的联合协作，适时解决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中的实施战略和重大政策问题，促进这一经济开发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我们相信，在中央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中西部发展方针的指引下，在费老等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下，在黄河上游各省区的通力合作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工作一定会迎来一个灿烂和辉煌的明天。

为了农民的富裕和 少数民族的振兴

白立忱*

费孝通教授是一位蜚声中外、成果卓著的社会学家。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就把自己对社会研究的方向确立在农村，把中国农民的脱贫致富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课题，把乡镇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实验室”。费老对社会的研究摆脱了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而是坚持实地调查、实效分析、实证研究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改革开放以后，费老恢复了曾经中断了一个时期的研究，依然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农村。他不顾年事已高，多次深入农村实地调查，特别是通过对小城镇发展的调查，敏锐地指出，乡镇企业的兴起将对农村脱贫致富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意义。他在《小城镇大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是具有中国特色工业化的新道路。实行几亿农民离土不离乡、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是富民强国的方略。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费老的调查和他所作的理论概括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88年4月，我在北京参加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和当时的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同志、青海省省长宋瑞祥同志根

* 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据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教授的倡议，酝酿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费老对这一设想非常重视。会议期间，费老把我们请到民盟中央开座谈会，费老表示，要充分发挥中国民主同盟智力密集的优势，借东风、走西口。具体研究甘、宁、青三省区如何利用黄河上游的水能和该地区的矿产资源所形成的潜在优势，全面推动当地经济的迅速滚动开发，进而实现全国经济协调发展。我当时感到，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增长，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社会学家，费老又把他对社会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大西北，转移到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他把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又总是力求进行超前研究，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他的这种治学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

就在 1988 年的夏天，为了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构想，费老又亲自到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的阿拉善盟作实地考察。他在考察中说：“这个开发区包括 1000 里黄河，1000 万人口，包括两省一区（青海、甘肃、宁夏）实际上应该把内蒙古也包括进来，成为两省两区的协作……这块是个穷地方，可是水利和矿产资源很丰富……以此作为开发大西北的基本能源”。费老又说：“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发展战略必须考虑民族因素”。要好好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利用国家给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政策，“政策里面也有含金量”。费老强调指出，“最后考验成功不成功要看你这个地区发展起来了没有，人均收入是不是提高了”；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到让老百姓富起来”。他在以后的一次讲话中又说：“怎样缩短、消除西部与东部之间在社会经济上的差距的问题把我带向西北去进行观察和思考。”“面对西北地区广大城乡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我不由得不联系到沿海地区的情况。一相对照，就不难看到双方正可以互补短长……这个思路使我产生‘全

国一盘棋’的观点。1988年我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是从这个观点中发展出来的。”费老的这些思想和观点，不仅对民盟中央组成的考察组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也对我们进一步深化对西北区情的认识，以及从全局着眼看待东西部差距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发。

在费老的直接指导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民盟中央考察组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这个《建议》对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的区情分析和开发思路提出了许多深刻而有益的见解。从资源角度看，这一地区不仅地域辽阔，而且是一块各类资源极为丰富的宝地，地上有取之不尽的水力、风能、光照资源和珍贵的生物资源，地下有储量极大的煤、油、气和多种矿产资源。如果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开发区进行综合开发，其发展速度 and 经济效益必将大为改观。从民族工作的角度看，这一地区是汉、回、藏、蒙古等多民族聚居区，这一地区的发展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促进这一地区经济社会较快发展，是全国民族大家庭共同富裕的需要。从产业结构看，这一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水、电、有色金属、煤等大量资源，并有相当的生产能力和潜力，有条件大力发展原材料生产，成为我国一个统一的原材料生产的重要基地。根据这一要求，统筹规划，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可以发挥这一地区综合开发的整体优势，同时也能克服产业结构趋同化的弊端。

1990年，国务院复函民盟中央，对这一建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指示国家计委在研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统一考虑。复函中还特别表示赞成费孝通教授提出的把该地区农牧业的发展放在首要地位的意见，指出：“花大力气解决粮食问题，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开发资源、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在以后的几年里，费老又在许多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一地区经济开发的思路及其对于全国经济发展格局和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在这一地区工作的各族干部和群众来说，一直是个很大的鼓舞和起着指导的意义。

值得我们高兴的是，费老当年给予极大支持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设想，党中央、国务院和这一地区的党政领导一直挂记在心，许多建议和具体设想正结合当地建设开发和扶贫规划在逐步实施之中。1994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率领的水利农业专家组赴甘肃、宁夏两省区实地考察。在宁夏，考察组深入贫困山区，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认为只有解决水的问题才是改变这一地区贫困的关键。在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共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扶贫扬黄新灌区的“1236”工程的构想，即大体用6年的时间，投资30亿元，开发200万亩水浇地，解决100万人的贫困问题。这是从根本上改变宁夏南部山区贫困面貌的奠基工程。10月，全国政协提出了《关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扬黄扶贫灌区作为大柳树第一期工程的建议案》。全国政协领导同志认为，“1236”工程对于加强民族团结、解决宗教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建议把“1236”工程列入“九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236”工程体现了全区500万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目前全区上下万众一心，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1995年开工建设。

当年费老在甘肃考察时大声疾呼：“黄土高原名声不好，连黄色都被连累成了贫困的象征。其实黄土高原就是怕旱，只要有水不难成为郁郁葱葱的绿色海洋”³⁶；只要留得住天上的雨水，只要用得上黄河里的水，只要积得够祁连山上泻下来的雪水，只要提得上大片土地下的潜水，总之有了水，黄土高原还能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号称全国‘贫困之冠’的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穷就穷在缺水上，而“1236”工程的重点就是将黄河水送上贫困干旱的山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广大回族群众说，只要有水，我们

也能致富。如今，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工程即将开工，世世代代经历着干旱折磨的山区人民将结束贫困的历史，费老的预言必将在宁夏实现。

199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费孝通教授的《行行重行行》一书。这本近50万字的著作，收集了费老在八十年代十年里所发表的与乡镇发展研究有关的35篇文章。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是中国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理论概括，这部著作已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十多年里的伟大创举，把费老的学术研究推入“黄金时代”。正如费老在这部书的“前言”中所说的：“八十年代我学术生涯得到重生”。在这个“得到重生”的“黄金年代”，使他所倡导的中国社区研究由农村推向小城镇，进而推向区域性战略研究的高度。中国乡镇改革的社会实践，农民摆脱贫困的深刻变化，对他的研究成果和富民强国的社会主张给予了最具说服力的验证。阅读费老这部著作里的每篇文章，我们不仅领略了费老那种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实事求是的朴实文风，而且似乎能看到这位老学者正行进在祖国广大乡间小镇里那风尘仆仆的身影和重重叠叠的脚印，这就不难理解费老为自己的这本精心选编的文集起名《行行重行行》了。同时也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费老是一位用毕生精力为中国农民的富裕和少数民族的振兴而辛勤研究并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理论家。我们也希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们要像费老那样，面向社会，作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反映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情系凉山

康振黄 汪义诚*

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的。青年费孝通新婚不久就进了广西大瑶山地区实地考察，把学术研究的根深深地扎在民族地区，历艰辛坎坷而不悔，且愈久弥坚。在他又有可能进行学术研究的八十年代初，他把研究的重点之一，又放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对民族地区有点‘偏心’”，主要是感到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很不公平，以致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了。我有一点‘抱不平’的心情想去帮助少数民族”。八十年代后期他多次去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这些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区，足迹还印在了海南的黎族之乡，可是他没有去过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地区。1991年6月应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的邀请，由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华陪同（费老是国家民委的顾问）他来到了凉山地区。

费老这次对凉山地区考察的学术成果和生动情景，已集中反映在他考察后给中共中央写的建议书《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和他的《凉山行》一文中。作为这次考察的随行者，我们只就某些情况作些补充记叙，

* 康振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汪义诚：民盟四川省委副主委

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佩的心情。

“老牛向西行”

八十年代是费老对于乡镇发展和区域经济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他的研究成果都是一路实地考察，一路调查研究得来的。从他家乡几个小城镇开始，逐步扩展到长江三角洲以及沿海一带到珠江三角洲。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促使了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的飞跃发展，对此，费老作出过他自己学术上的贡献。东部的发展，一时引起了相当普遍的“孔雀东南飞”，而费老研究工作的触角却伸到西部边区的经济发展上来了。从1984年起，他连续几年风尘仆仆地行进在内蒙古草原和“西出阳关”的古道上。人们半是不解，半是赞叹：“少壮东南飞，老牛向西行”。在他研究西北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取得成果后，这位学术界的“老黄牛”又动起了研究大西南山区经济的念头。1991年6月，他的凉山之行，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开端，也是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又一步深入。

1991年6月4日晨，费老一行由京乘火车抵达四川省的成都市，当晚即去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市。6日开始，从西昌换乘汽车，考察了四川的盐源县和云南省丽江地区所属的宁蒗彝族自治县，以及湖面在云南一边的泸沽湖摩梭人聚居处，然后转到四川的攀枝花，再乘火车折回西昌，又转乘汽车去考察了原来凉山州的首府昭觉县。已是耄耋之年的费老，不顾年老酷暑，九天里，颠簸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公路上，坐在越野车里，他自己戏称为在跳“迪斯科”。全部行程达1300多公里，足迹遍及川滇两省的大小凉山地区、两市（西昌、攀枝花）三县（盐源、宁蒗、昭觉）以及川滇交界的泸沽湖。一路上，费老不仅听取州、市、县、乡干部的汇报，还不时地停下车来

走访彝胞和摩梭人的村寨，对四家彝胞、一家摩梭人农户进行社会调查。在昭觉等县，费老详细了解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作为民族学学者的费老在盐源、宁蒗县和泸沽湖畔，不仅了解了摩梭人的历史渊源、民俗风情和现代摩梭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还深入摩梭人农户，同摩梭人共进午餐，在摩梭人的“床铺”上小憩。一路上，费老还多次在彝胞的村寨、庭院里踏歌起舞，共饮“杆杆酒”，与彝胞孩童亲昵逗趣。他满怀激情地为盐源县题词：“加强民族团结，振兴凉山经济”，道出了他的一片赤诚。山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与科技，费老一路行来，还特地视察了宁蒗县的宁海中学和费老担任名誉董事长和名誉校长的凉山大学。费老这位学富五车的耄耋学者，这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民族的事业，为学术的探求，仍像他五十多年前进大瑶山区那样，更加只争朝夕地在深山老林里进行社会调查，时刻心系着发展民族经济、解除民间疾苦。费老一到盐源县，盐源县的领导同志激动地说：“费老是第一位到我县视察的国家领导人”。他的确是和穷乡僻壤的群众心连着心。

“一点一线一面”与“四个结合”

费老初访凉山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点一线一面”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即由凉山州及攀枝花市合作建立攀西开发区，以此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在德宏出境西通缅甸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的设想。

为了做好这次考察的准备工作，民盟四川省委先期把中共四川省委老领导杨超同志的《关于在我国西部将攀西及滇西北金沙江沿线列为资源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以及中国农学会、四川